图书情报工作
第62卷 第8期 2018年4月

智库建设中情报的功能定位与功能实现*

李品[1] 杨国立[1,2]

[1]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2] 江苏大学图书馆 镇江 212013

摘要：[目的/意义]探索情报在智库建设中的功能作用，拓展情报研究发展空间。[方法/过程]以智库功能与情报功能的区别与联系为逻辑起点，以智库建设中前期、中期和后期对情报的需求为考察对象，开展情报功能定位及其实现研究。[结果/结论]在情报对于智库建设的功能定位上，探究情报与智库的融合和情报对智库的嵌入；并据此，从前期资源支撑功能、中期分析辅助功能和后期评估保障功能三方面，分析情报功能在智库建设中的实现策略；最后论述在大数据环境下，这些功能的新特征及其实现的新手段。

关键词：智库 情报 功能定位 功能实现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8.08.012

1 引言

总体来说，我国智库存在数据资源落后，评估体系不完善，知识集成能力欠缺，政府“命令性”研究的参考效用后置导致的阐释性研究多于前瞻性研究等不足[1]。从建设前端来看，数据资源不充分将直接影响智库对政策的宏观把控和战略部署；中端的分析过程中，情报的分析与集成能力的欠缺导致智库面对问题导向的政治决策丧失操作能力；至于后端的成果输出，情报的研判能力的缺失，使其难以列入高端行列。由此看来，从情报的视角提升智库能力建设已势在必行。

情报学者是较早关注智库的一批人，情报机构“转知成智”的功能与智库定位不谋而合。但因情报机构的低调[2]、情报研究缺乏主动性，被动地接受政府或企业的委托等原因，使得情报对于智库发展鲜有作为。在信息更新速度空前的网络时代，信息资源的获取、利用与增值能力是智库实现政策咨询、分析及知识创新服务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在政策咨询服务中，智库专家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不对称和对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的依赖性依然是其进行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分析和政策咨询的最大障碍[3]。除此之外，如著名智库评价专家詹姆斯 o 麦克甘所言，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就是其“独立性”——很多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无法实现更为广泛的交流与合作[4]。在大数据时代，支持政府决策所需的信息知识范畴不断拓展延深，而智库具有跨领域、学科、机构，需协同合作的综合特征，若智库之间缺乏沟通与协作，智库与其他机构之间缺少合作、对接及耦合，则无法克服智库单一组织与机构在其知识结构上造成的局限。

情报的战略起源和竞争土壤是决策层天然的变革工具，天生就带有政策咨询色彩，与政府有着似远实近的关系。情报研究的信息资源建设、信息平台搭建、技术评估服务等传统功能及其政策咨询服务属性和先期服务经验[5]，无疑可以填充和弥补智库发展的局限和缺陷。鉴于此，与智库“志同道合”的情报研究应切合地把自身信息资源优势，信息采集、处理、加工、分析优势，信息深度挖掘优势，特色数据资源的整合优势，学科评估优势等充分发挥到智库的建设中来。

2 相关研究分析

对智库的关注拓展了情报研究的空间。2011年以来，情报学者对情报与智库的关联研究给予了足够关注。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大体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情报在智库建设中的作用研究，这类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智库建设中的情报服务体系建设，如王世伟教授从6个方面对情报工作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进行了分

*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Intelligence导向的情报学知识体系与核心问题域研究”（项目编号：17TQB00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品（ORCID：0000-0002-0762-177X），博士研究生，E-mail：376341195@qq.com；杨国立（ORCID：0000-0003-2763-4161），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7-10-10 修回日期：2018-01-09 本文起止页码：93-99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析[6]，这6个方面大体可归纳为智库建设中情报服务主体建设、服务产品开发和服务方式与内容设计3个类别；吴育良从基础性服务、推荐性服务和评估服务3个方面同样对情报在智库建设的前端作用进行了分析[7]。第二类是情报与智库的关系分析，这类研究普遍肯定了情报与智库之间在基本功能、内在机能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如李纲教授从机构关系、外在条件、内在机能、学科关联4个方面探讨了情报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关系[8]，最后确证了情报与智库的双赢关系；张家年认为，情报工作是智库运行机制的重要基础[9]。第三类是情报服务面向智库的转型研究。这其中既包括基本服务模式的转型，如黄如花教授提出，情报服务可以为智库提供知识咨询服务、情报技术支持、信息计量服务、智库成果复用等[10]；也有对情报机构的转型研究，如王延飞教授认为，情报机构具备进行智库转型的基础条件，情报机构未来有可能转变成适合现代决策要求的新型智库[11]。

上述研究成果肯定了情报在智库建设中的基本作用，但多集中于对情报服务内容、模式的研究。服务内容无法替代服务功能，正确的功能定位是基于服务内容与模式设计导向，能够使服务内容更加系统化、聚焦化。情报的功能定位即是在情报能力与智库建设需求匹配基础上，明确情报在智库建设中独特的位置及作用。

3 情报在智库建设中的功能定位

智库本身的功能与情报功能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在面向同一政策时，不同类型智库会从不同学科角度加以分析，而情报研究更突出从综合性角度加以分析，不强调某一具体学科；情报功能强调“谋”，而智库功能则强调“断”[2]；相对于情报而言，智库对自身功能的影响力更加重视。这些区别恰好构成了智库与情报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了情报与智库的关联、融合以及情报对智库的嵌入。

3.1 情报与智库的关联

智库，又称之为思想库、智囊团，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和咨询，为决策者提供献计献策的智力支持，对政府企业等目标客户的情报需求提供智慧服务。因此，智库说到底应是一种决策咨询机构，其核心目标是政策研究，并需要相应学术研究的支撑[12]。而情报机构则是对海量信息进行处理、加工，产生高质量的情报产品，为决策机构提供决策的信息支撑和保障。在信息网络化的现今，情报机构进一步向信息挖掘和深加工深入，承担着情报的服务、组织、挖掘、管理、分析等任务，涉及科技查新，定制服务等类似于智库功能的诸多领域。在这里，智库的决策咨询功能与情报的“耳目、参谋”效用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古今中外，从明朝东厂的最早特务情报机构，唐朝中枢门下省的类智库决策机构的部门设置遵循“情报服务于决策”的原则，到现今美国的决策机制，同时倚重情报机构和智库向决策层进言。情报机构与智库不仅仅是“相辅相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在未来，他们更是追求“深度合作，谋求共赢”的关系。情报是决策制定的基础和保障，情报机构的功能是为决策层提供支撑决策所必需的、特定的情报信息。智库是以服务于决策为导向，它的功能是发挥“众筹智慧”的效用，针对政府、企业等客户的情报需求，为决策层建言献策，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可见，智库与情报就其功能及服务于决策的本质来说，是密切关联的。

此外，智库研究更多的偏重于应用性研究，情报研究亦是如此，二者都具有以目标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特性，他们的各自特征与服务理念是紧密关联的。就智库建设和情报研究而言，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是二者完成功能使命的学科特色和基本需求，情报学也由此作为智库的重要支撑学科，他们的学科关联体现在情报对于智库信息保障中的“信息呈现”（信息组织与利用）、“文献再现”（文献检索与查新）、“知识发现”（知识挖掘与发现）以及“情报映现”（情报分析与服务）等方面[8]。总之，智库依赖于情报资源作为其成果产出的有力支撑，情报产品通过智库的推广又可以带来影响力的提升，二者不仅关系密切，而且相互倚重，交替影响，在学科导向上形成良性循环。

3.2 情报与智库的融合

智库与情报自产生以来就颇有渊源，从其服务的对象、目标、方法、机理等方方面面看来，二者始终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之态。智库的建设因其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双轨并行的发展任务，可以解决情报学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难题，从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情报学的发展；情报机构自身的丰富资源及多元化的学科特征，为智库提供创新知识及战略决策服务所需的信息保障，对智库建设起到前端的基础支撑和辅助支持的作用。他们的融合体现在智库从理念、产生到运作中无所不在的情报影子：

（1）智库的情报能力。当今对情报机构转型为智库的呼吁以及情报机构本身就是智库的观念，来源于智库本身就具备极强的情报能力。服务于决策作为智

李品，杨国立. 智库建设中情报的功能定位与功能实现[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8):93－99.

库的重要属性,它所承载的诸如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能力,对外界变化的应急反应能力,对外界态势的前瞻预测能力,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能力,对竞争对手的监督和分析能力,政策战略的制定和评估能力,信息的安全及自我保护能力等,实质上皆为情报能力。情报的两大基本功能:一是解释和说明,二是预测和评估。这也正是智库提供决策服务所应具备的本质属性。换言之,智库具有对情报能力的天然需求。

(2)智库的情报活动。国际上知名、成熟的智库,会定期、不定期地向决策层提供深层次、高质量的"情报产品",这种科学有效的"情报产品"的产出过程,伴随着相应的情报活动。智库的工作流程和决策战略一般来说本着深入调查、资料收集、分析研究、制定方案、持续关注的"五步走"原则,恰恰体现和对应着情报搜集、分析与服务的活动流程,注重的是分散情报的积累与整合。在信息网络日益发展的当下,情报产品向集成、电子及网络化发展延伸,逐步细化为"一次""二次""三次"以及"思想型""信息型"等"情报产品",智库也随之形成自身较为成熟的情报产品体系、研究方法及形成机制等来支撑决策需求[13],在这种环境下,智库的情报活动也与时俱进地拓展到网络空间、风险管理、舆情监测等领域,对原有的情报库不断填充、激活、累积和更新来规避关键情报的缺失。情报活动对于智库来说,起着支撑其产品与服务有效输出的关键性作用。

(3)智库的情报机能。智库的内在机能涉及战略性建言献策、社会舆论引导、高端人才储备等功能作用[8],高端优秀的智库会通过广阔的情报视野来提升其机能的效用。换言之,智库资政启民服务的有效发挥须借助于情报机能的融入与完善。智库内在机能的核心是影响力,影响力依赖于智库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质量保障则建立在情报产品的需求、设计、收集、分析、处理、评估以及利用的基础上,可见,智库的情报机能是情报产品设计与开发全过程的体现[14],若保障智库内在机能的有效发挥,需强化对情报机能的介入融合。

除此之外,智库还融合了情报意识、情报功能、情报战略等方方面面,以捕捉外界海量的信息、知识及情报,为决策服务产出高端的智库产品和设计方案。

3.3 情报对智库的嵌入

如前所述,智库与情报的关系密切、渊源颇深,在信息网络化发展突飞猛进的当下,传统智库需要借助情报的嵌入,使其在智库工作的前端予以介入,中端加以分析,后端趋于完善,发挥与时俱进的作用,帮助智库适应大数据、互联网＋新时代下的知识需求。新的环境有新的需求,传统的情报研究通过文献调研分析来对智库建设加以理论指引,帮助其锁定研究领域、聚焦热点问题等嵌入方式已无法满足未来智库所面临的大视角下的知识服务与决策需求。情报研究已越来越多地将自身的概念、要素、机理、方法、技术、服务等内容嵌入到智库研究与工作中,逐步加强情报学科框架与智库建设的有效结合。

(1)情报对于智库建设的嵌入。智库最基本的需求是信息情报资源的需求,情报学可提供战略、军事、专利、竞争、舆论等情报源,为智库创建与外界对话的便利通道,利用自身"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首先成为智库的信息库、知识库和情报库[15],充当智库建设的基础和保障作用。除此之外,情报对于文献、信息、知识的搜集整理、分析利用,对于智库的项目分析研究、产品质量监测、决策价值评估以及成果保存评价等方面全面介入到智库建设中。

(2)情报对于智库研究的嵌入。这种嵌入方式体现在情报研究的工具、方法、技术以及服务对智库研究的融合。如,情报研究中的信息与网络计量学、信息分析、数据挖掘等定量与定性信息的方法和工具是智库审时度势、解读热点乃至智库评价的有利依托与手段。情报研究新兴的信息定制、推送等个性化服务嵌入到智库研究中,可帮助智库研究未来学、信号发现等一系列与情报及智库内在机理相通的问题。在信息检索方面,情报的嵌入,可以通过信息再现、资源配置、检索结果优先级技术等满足智库研究所需。在知识管理领域,智库的创新知识服务模式及整合专家智慧的机制使其本身就自带知识属性,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提醒我们,智库产品的高质量产出势必要依赖于情报研究通过知识组织、知识利用以及知识创造的嵌入。此外,知识管理视角下的智库领域专家团队的动态演化问题也值得情报研究加以监测和关注。

(3)情报对于智库工作的嵌入。几乎所有知名、优秀的智库都拥有自己的各类专题、特色数据库,如兰德公司的专题数据库"Rand 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专题方法库"California Air Pollution Mapping Tool"等[16],这是情报对于智库工作最基础的嵌入方式。不仅如此,在全球范围的各类智库组织架构中,对于专门信息情报服务部门、专职信息协调主管的设置,对专题网络信息平台、数据库的建设,以及各类信息情报产品的出版已成为智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6]。情报对于智库工作的前端支撑是全球知名智库发展的普遍趋势和规律,情报对于智库工作的嵌入,不仅为智库所需数据、资源及决策提供支持和保障,也是智库得以展现其优质高端的硬实力体现。

4 情报功能在智库建设中的实现

完整的智库活动和工作流程可归纳为三个步骤:前期的资源获取和信息搜集,中期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分析,后期的方案拟定与思想输出。这一过程实际上嵌入了情报处理流程,智库的信息资源通常来自于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各类公开数据源以及图书情报机构的数据库资源等[17],这需要借鉴情报收集策略与技术;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是情报工作的核心功能和业务能力[18],这有力地保障了智库中的政策研究与决策分析;智库最终产品是战略决策和创新知识服务,而决策的形成和知识的创新是遵循情报理论中信息链的演化路径和规律的[9]。由此看来,智库工作流程中的三个阶段依次需要情报资源获取功能、情报分析处理功能、情报评估利用功能的支撑。

4.1 情报之于智库的前期资源支撑功能

大量的信息、资源和数据是智库开展咨询工作的前提,尤其是大科学、大工程的实施,更需要智库充分发挥其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本优势[19]。情报研究可以通过资源建设、信息激活、提供情报产品、构建情报信息网络等发挥前期的支撑作用。国外知名的智库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专题数据库,如美国兰德公司开发了 CalWORKs 数据集、背景数据图书馆、公共健康备用数据库、兰德 - MIPT 恐怖事件数据库和兰德圣战声音数据库等[20]。在我国,缺乏“大数据”意识的政策分析,使得智库的资源始终依赖于外部的统计数据,对专题数据的长期积累和开发缺乏敏感性。目前国内基于文献、专利的研究分析所采用的数据库多为国外所建,不利于原创成果的产生。情报研究可以根据智库的信息需求来指导其信息建设,为智库建设储备资源,提供保障。

首先,根据智库特定的需求可建设原始的基于政策分析的特色专题数据库来进行原始数据与信息的积累;其次,把智库开展工作过程中制造和产出的二手信息和规律数据有效地整理保存,进行再生数据与信息的积累;最后,开发及公开“共享平台”,开通“情报源”通道,提高智库的公众影响力。帮助智库打造知识库、思想库、策略库,并对这些专题数据予以持续跟踪、更新及积累,接下来就要把储备的数据信息加以激活,挖掘可利用资源的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这需要情报人员在把握国家、科技宏观发展的态势下,从问题导向出发,加强对信息规律的把握,根据问题的异样化特点,创新适用性强的情报分析方法和工具。信息建设的基础和信息激活的加工都是为了形成信息产品,情报分析产生的诸如调研、分析报告、简讯、公告和年报等系列产品不仅可以为智库的前期建设提供支撑,还可以充当智库本身系列研究成果的重要成分。此外,搭建国际情报信息网络,构建智库决策支持系统也是高端智库的发展趋势,如斯坦福研究所除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总部外,在国内的华盛顿、新泽西,国外的中东、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都设有办事处[21],情报研究通过构建全球性的信息网络及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更好地支撑智库的情报服务。

大数据时代,情报对于智库的资源支撑向着标准化、流程化、协同化及集成化方向发展,智库的情报源也拓展到所有可以利用的网络、数据和人力资源。对大数据环境下海量信息、异构信息的获取、利用,对多源信息的共享、融合成为情报对于智库资源支撑的优势,智库建设可以借助情报手段,对全样本进行分析,以发现大数据环境下时事政策变化中的新变量,发掘无关变量数据的显性关联,挖掘出更多的因果解释机制,来提高智库产品的时效性与科学性[22]。此外,大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及分阶段管理成为了情报支撑智库决策系统及信息处理中心构建的关键。帮助智库打造、长期积累并持续跟踪知识库、专题库,可以变情报的信息优势为智库的决策优势,提升其思想观点的质量和决策的影响力,助力于智库实现为不同层次的科学决策服务功能[23]。

4.2 情报之于智库的中期分析辅助功能

除了前期的资源建设基础,情报功能对于智库建设的有效发挥,还体现在通过自身的技术方法,统计工具提供研究分析服务助其满足政府的决策需求。情报研究成熟的方法体系与优良的计算传统对于智库的决策分析起到强大的辅助作用,它使智库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突破传统文献计量与专利分析的局限,通过情景感知、PEST、决策树、层次分析、可视化等研究方法解决智库基于问题导向的知识发现、知识推理、舆情监测、信息提取等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情报分析工具与技术已不断地融入到智库建设中,如 HPCC、Penta-ho BI、Splunk、Apache Drill、Hadoop 等,这些工具一方面拓展了智库情报功能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提高了智库进行情报分析研究的效率与效用。此外,对于重要

的决策咨询与部署研究,情报研究与智库在方法论上的融合与协同分析,符合时下科技创新的研究范式,不仅可以实现优势的互补,还能优化智库的决策支持机制。情报研究对于情境与战略环境的研究以及技术与人文语境的双重分析,推动智库之于人文理念下的交互式情报功能的拓展。情报研究对于数据的实时分析与预测,对于智库的短期决策支持,尤其是深思熟虑以及动态应急方面具有较高价值的契合性,可提升政策咨询对智库能力提出的精准可靠,又不失实效性的需求。

大数据对传统智库的建设发展带来了延伸,更有利于其把握经济、社会热点及动态,使精准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对智库的数据获取、分析处理以及快速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具备关联性、增值性、多层次、多维度等特征,以此来协助智库增强时事政策的深度研判及预测能力,使其较为自如地应对行为分析、信息不对称、风险评估等问题。从情报视野对智库在大数据环境下的能力体系、运行机制加以整合,可有助于提升智库技术方法体系的路径,寻找优化智库人才结构体系的方法以及打造信息共享体系平台[22],使得智库的情报工作趋于自动化、规范化、系统化,走向新的研究范式,也就是情报工程化思维下的智库服务模式。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目前已有7%的机构达到情报工程化阶段[24]。这种思维融合了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有着技术与非技术要素并重的态度。借助工具分析与专家智慧,它嵌入到智库的政策研究、咨询决策与知识创新中,可实现内外部资源的集成利用,激活智库的运行机制,避免零散单向的智库情报研究,兼顾"情报用户"与"意见融合",保障智库产品的全面、科学、客观与独立,使得大数据环境下的智库建设可以实现资源建设的多元性,服务模式的多样性以及决策咨询的灵活性。

4.3 情报之于智库的后期评估保障功能

智库为社会生产实用性知识,服务于政府决策的属性来源于"思想输出"及"知识创新"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其生产成果就必须以客观、科学、全面的情报分析作为依据和保障。提供智库研究成果后期保障的情报分析具有情境性与人文性等复杂关联,这种主观关联的实现需借助于专家的知识和智慧加以判断。而智库作为输出思想、决策与知识的平台,亦需要吸收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高水平专家有价值和深度的建议是智库品牌的基本保障。可见,情报对于智库的保障功能带有与生俱来的契合性和使命感,智库若需产出快速响应决策者的研究产品,实现其行为与属性的融合,情报保障体系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固然可以追溯事件的规律和本源,但数据资源和技术方法也仅仅是从前端的角度为智库的情报产品提供集成化的平台。智库后期建设所需凝聚的智慧,具有远见与洞察力的决策方案和深度诠释,还应依赖于专家的情报素养、情报意识所带来的情报决策,专家集体智慧的群策群力是优质智库产品产出的关键保障。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使得智库究竟是服务于"决策"还是"决策者"一直饱受诟病,解决智库的"情报政治化"等干扰问题,避免"唯领导是从"的迎合上级偏好的决策传播是情报之于智库后期保障的关键[25]。具体的实践措施还应依赖于情报助力于专家智库的建设,组建内培式和外聘式两种专家团队模式,汇聚跨背景、跨学科、跨专业、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跨形态的精英专家,构建优质完善的团队资源组合,搭建专家智慧共享碰撞的互动平台,力求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最优化选择,实现情报生产者与决策者的互联互动。情报可提供执行团队优化、绩效评估措施、保障机制构建、专家权重排名等服务,保障智库的专家库建设,实现类似美国"旋转门"机制的研究与政策的相互强化与平衡。此外,情报之于智库建设的后期保障功能的一个重要发挥就是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后期监督评价,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优化智库的社会功能,保障组织有效产出的必备工具,只有准确定位智库的社会功能,达成合理的预期,对智库的水平、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进行合理评价,才能引领智库向中立、客观、专业的方向发展[26]。情报可以在智库的评价领域中发挥自身的态势分析、竞争力比较分析等优势,针对不同智库及其成果类型探索出多样化的智库及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为未来智库建设成效评估奠定基础。可引入情报研究的老本行即对智库报告进行定量评价,计算智库产品的产出量,点击率来衡量智库的规模和影响力等;对智库参与的国际事务会议,决策活动等进行定性评价,关注智库的宣传活动和受关注程度;利用调研方法检测智库的报告效果,立足于报告的观点和建议检验其依据事实的真实客观性,来评估研究产品及报告的可信度与科学性等[27]。

5 结语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新型智库的建设要具备情报能力和视野,随着智库建设所面临的情报源的大数据化、情报渠道的多样化、信息处理的自动化、运行

机制的协同化,情报的功能逐渐渗透和融入到智库的运行机制中[28]。它可以通过提供数据获取、加工、整理、保存、展现,知识咨询服务,智力资源复用,计量方法制定评估体系,绩效管理等服务将其特色功能融入到智库的建设中来[10],在智库建设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凸显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帮助智库提升影响力,树立社会威信。一方面,可以颇具成效地发挥其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中坚性的力量参与到智库的政策咨询服务中来。

为此,未来的情报工作应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将情报机构打造成国家重要智库。在中国智库索引收录的602家机构中,入围的情报机构不足5家[29],大部分省级情报机构没有入围。今后,省级情报机构应系统梳理自身的服务功能,更加密切地关注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动态,善于预测和发现各领域的战略需求和重大问题,并通过部门重组、体制机制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以智库模式加强自身管理变革。二是情报研究要强化对事实型数据和政策性文献分析的能力。一方面,情报研究要重视数值数据、法律法规数据、新闻报道数据、名录数据、科研产出数据、技术产出数据、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数据[30]等事实型数据分析,为智库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情报研究要密切关注各领域、各级别、各区域的政策性文献,并进行深入挖掘与关联分析,为智库决策提供策略支持。三是加强情报服务的平台化建设,并通过品牌建设、主动性意识培育等措施提高自身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贾品荣,伊彤. 国家科技政策智库咨询能力建设的路径模式[J]. 情报杂志,2017(1):59-65,34.
[2] 李刚. 从情报研究到智库研究[J]. 图书馆论坛,2017,37(9):50-54.
[3] 钱再见. 论新型智库的核心能力及其提升的创新路径[J]. 江海学刊,2017(1):105-113,238.
[4] 柯白玮. 黑洞运营中国智库困局难破[J]. 中国智库,2013(2):141-149.
[5] 金学慧,夏勇琪,付宏. 情报机构参与智库建设的SWOT分析与策略选择[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4):64-71.
[6] 王世伟. 试析情报工作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以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为例[J]. 情报资料工作,2011(2):92-96.
[7] 吴育良. 图书情报机构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J]. 图书情报工作,2012,54(S2):29-31.
[8] 李纲,李阳. 情报视角下的智库建设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5,59(11):36-41,61.
[9] 张家年,卓翔芝. 融合情报流程:我国智库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研究[J]. 情报杂志,2016,35(3):42-48.
[10] 黄如花,李白杨,饶雪瑜. 面向新型智库建设的知识服务:图书情报机构的新机遇[J]. 图书馆,2015(5):6-9.
[11] 王延飞,闫志开,何芳. 从智库功能看情报研究机构转型[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38(5):1-4,11.
[12] WELLS P. Prescription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ilemmas: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the governance of regional policy[J].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2,90(1): 211-229.
[13] 季婉婧,曲建升. 国际典型科技智库的类型及其产品特点分析[J]. 图书与情报,2012(5):93-98.
[14] 李纲,李阳. 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功能定位与体系构建[J]. 图书与情报,2016(1):36-43.
[15] 陈超. 情报与智库[J]. 竞争情报,2015(2):3.
[16] 郑雯. 美国兰德公司情报研究工作特点及启示[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35(7):126-128.
[17] 安楠,祝忠明. 国外智库数据搜集策略及其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挑战[J]. 图书与情报,2017(3):134-140.
[18] 郑彦宁. 我国科技情报机构核心业务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7(4):444-446.
[19] THUNERT M. The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 Support Centre (IDSC) of the Egyptian cabinet: a think tank in the making[J].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beratung,2009,2(4):679-684.
[20] 周琪. 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及运作——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J]. 人民论坛,2013,35(2):8-14.
[21] 李阳,李纲,张家年. 工程化思维下的智库情报机能研究[J]. 情报杂志,2016(3):36-41,48.
[22] 吴田. 大数据助推新型智库建设[EB/OL]. [2017-06-16]. https://www.sinoss.net/2017/0601/76999.html.
[23] 宋忠惠,郑军卫. 图书情报类期刊中的智库相关研究评价与分析[J]. 情报杂志,2016(8):145-150.
[24] WIARDA H J. Think tank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M].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2010: 29-30.
[25] 沈固朝.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智库[EB/OL]. [2017-06-16]. 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2012skb/sz/userobject1ai7770.html.
[26] 薛澜. 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5):6-10.
[27] 袁建霞,董瑜,张薇. 论情报研究在我国智库建设中的作用[J]. 情报杂志,2015(4):4-7.
[28] 包昌火,李艳,王秀玲,等. 竞争情报导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9] 中国智库索引. [2018-01-08]. https://ctti.nju.edu.cn/CTTI/organization/toSearch.do.
[30] 贺德方. 基于事实型数据的科技情报研究工作思考[J]. 情报学报, 2009, 28(5):764-770.

作者贡献说明:

李品:论文构思和撰写;
杨国立:论文修改。

李品，杨国立. 智库建设中情报的功能定位与功能实现[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8):93－99.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

Li Pin[1] Yang Guoli[1,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2] Library of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ink tank and exp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made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difference and relation between think tank function and intelligence function, took the demand for intelligence at the earlier stage, medium-term and later stages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s the analysis objects, and then, explore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fusion of intelligence and think tanks and the embedding of intelli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Besides, it explores the realization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ce fun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from three aspects, which including pre-period resource support function, mid-term auxiliary function and post-period assessment function.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new feature of the above three functions and their new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in big data environment.

Keywords: think tank　intelligence study　functional orientation　functional realization